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近代日本對抗軸—亞細亞主義：日本近代史與戰爭的二重性

Japanese Modernity and the Axis of Resistance-Asiaism: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and the Duality of War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05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林鍵麟(Jian-Lin Lin)

頁數/Page：45-5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亞洲作為抵抗線的問題意識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45-57

近代日本對抗軸——亞細亞*主義： 日本近代史與戰爭的二重性**

Japanese Modernity and the Axis of Resistance —Asiaism: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and the Duality of War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林鍵鱗 翻譯

Jian-Lin Lin

輔仁大學日文系碩士

特別是在世界史偉大的轉換期，若日支兩國能同心協力的話，
亞細亞復興之事，當有如唾手可得吧。
——大川周明，《大東亞秩序建設》

要將西鄉視為反革命，又或永久革命的象徵好呢？
或許是件無法輕易解決、充滿爭議的問題吧。
但，若不與此問題一併討論，也就難以去定義亞細亞主義。
——竹內好，《日本亞細亞主義》

一、為何是兩種戰爭

竹內好於「近代的超克」再論中說到：「大東亞戰爭在屬於殖民

* 編按：亞洲與亞細亞二詞同時出現於本專刊之各篇文章內，為尊重原作者之使用脈絡，均保留作者原使用字詞。

** 本篇由子安宣邦教授及日文版發行單位青土社同意授權，出自子安宣邦新著：《「近代の超克」とは何か》（何謂「近代的超克」），東京：青土社，2008。本篇為第11章〈アジア主義という近代日本の対抗軸：日本近代史と戦争の二重性〉，頁209-229。

地侵略戰爭的同時，也是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這兩個側面從事實上來看是融為一體，但在邏輯上卻是必須要去加以區分的」。此「大東亞戰爭」的兩個側面對竹內好而言，是與「近代日本的戰爭傳統」有所聯繫的。也就是竹內曾說過的：

大東亞戰爭確實有著二重構造，此二重構造是從征韓論開始的近代日本戰爭傳統而來。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是一方面爭取東亞領導權，另一方面則藉由驅逐歐美以達成稱霸世界目標，兩者之間有著補完及相互矛盾關係。

這兩個側面中的前者，也就是日本「爭取東亞領導權」是以日中戰爭（日華事變）來表現；後者的「驅逐歐美以達成稱霸世界目標」則是以太平洋戰爭這種軍事性的方式來表現。因此，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兩個側面，就是指日中戰爭與太平洋戰爭這兩場戰爭。此兩個側面又或是兩場戰爭，也就像竹內所說的，原本就是相互補完，且應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兩個側面。但，竹內又從此兩個側面中看出其相互矛盾的關係，稱其為**兩種戰爭**，不僅如此還將此二重性與近代日本的「戰爭傳統」相連結，加以延伸並擴大。

在昭和時代，日本帝國國際戰略的理念乃是由身為東亞領導國家的日本來推動追求東亞新秩序的建立。所謂新秩序的追求，是指追求既有世界秩序的重整，且與位於歐洲的德國有著世界戰略性的呼應關係，因此新秩序本身原本就蘊含著無法避免世界大戰這樣的結果。而我所理解的昭和帝國式國際戰略，是否受到某種二重契機所規定著？追求東亞新秩序的建立與參與世界大戰的決心，兩者間是否有兩個各不相同的某些契機在作用？抑或日中戰爭與太平洋戰爭間是否有著完全矛盾的存在？也許，在「事變」與「戰爭」之間，日本政府、軍部的當事者中也對其存有懷疑、猶豫和不同的意見。再者，日本國民在情感上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解，認為前者絕對是「事變」，而對於後者則直覺性地認為是「戰爭」。不過包括竹內在內的知識分子或國民都對12月8日的宣戰相當感動，並感受到了豁然開朗的心情。這是因為對於曖昧的「事變」，找到了「戰爭」這樣明確的回答。那不算是對中國的帝國主義戰爭嗎？人們對於「事變」所抱持的如此疑惑，也隨著為確立東亞永久和平，對英美發動「戰爭」而一掃而空。

但即便經過情緒性的自我解讀而掃除對「事變」的疑惑，卻也無法改變「事變」與「戰爭」都屬於帝國主義戰爭的事實。這是一場由盎格魯—薩克遜(Anglo-Saxon)世界所支配、壓抑的亞洲所發動的反抗「戰爭」，只是用地緣政治學的理由所產生的正當性感情，來掩飾在中國之「事變」中的不正當性罷了。

這樣看來，竹內所說的**兩種戰爭**，似乎只不過是指在日本人情感上像這樣「戰爭」與「事變」的不同。太平洋戰爭是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而日中戰爭則是中國侵略戰爭。竹內表示，關於前者，日本不應該擔負被「文明」之名審判的責任，但關於後者，則需要大大地負起侵略的責任。這就像我方才所提及的，因為後者是由亞洲所發動的「戰爭」，是從地緣政治學的理由所產生的非理性正當性，以及前者是在中國之「事變」裡所隱藏的不正當性，竹內似乎以此來區別這兩種戰爭。因此在之前〈「近代的超克」與戰爭的二重性〉一文裡我也曾提到，竹內所謂的兩種戰爭論，在本質上不就只是依循戰爭責任論之文脈而已。不過竹內所謂的兩種戰爭論，只是在討論到底是對抗帝國主義戰爭，還是殖民地侵略戰爭，這樣的區別而已嗎？若是如此，其實這兩種戰爭不過只是帝國主義戰爭相互補完之兩側面罷了。不過從竹內將此區別追溯到征韓論，並延伸解讀到日本近代史上這點來看，可以想像此區別中必然還隱藏著更大的思想契機。

二、日華事變尚未解決

竹內在「近代的超克」再論裡，追隨著大川周明的腳步，對日華事變無法解決一事的說法提出自己的想法，他寫道：「大川的嘆息，就是爲了日華事變在1941年無法解決所發出的，但在1945年時未獲解決，1959年的現在也仍然未能得到解決，這是眾所皆知的」。竹內在此所謂的「大川的嘆息」，是從大川的《大東亞秩序建設》裡所提到「日支兩國非得如此不斷交戰下去嗎？這確實讓全體國民爲之深深嘆息」這番話而來，那麼感嘆「支那事變」（編按：即七七事變）未獲解決現狀的大川，對於事變解決有著怎樣的看法呢？

大川說將「支那事變」視為「世界大戰的一個環節，應和世界大戰一起作處理的意見，吾等是絕對難以首肯的」。當時一般認為，不應該將事變看作「日支兩國間的關係」。由於事變的背後存在著英美兩國，現在事變已發展到對英美戰爭。因此一般都會認為「支那事變」應該要與對英美之世界大戰作同步處理。然而，大川卻對此表示反對意見：

支那事變是在歐羅巴戰爭（編按：指歐戰）之前，日支兩國之間所發生的悲劇。其解決之道是絕不容許第三者的介入，必須要靠兩國的直接交涉。再加上大東亞戰爭這一事實改變了支那事變的性質，使得支那事變成為東亞的一場內亂。吾等唯有盡早將此內亂平定，方能期待大東亞戰爭的圓滿順遂。

在此，也存在著將「支那事變」（日華事變）及「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當作兩場戰爭，並將其戰爭解決分開來處理的意見。大川認為，當時的軍事情勢的確已從「支那事變」進展到「大東亞戰爭」，雖然很不幸地現在兩國之間已採取了戰爭的手段，可是「日支兩國」本應是要為「復興亞細亞的大義」而相互合作的。讓我們來看看，他在感嘆「事變」未解決之現狀的同時，還說了些什麼吧。這能夠告訴我們，大川或竹內是透過什麼來區分「事變」及「戰爭」的：

日支兩國非得如此不斷交戰下去嗎？這確實讓全體國民為之深深嘆息。就算用一般常識來想，也知道只要日支兩國相互理解、握手言和就能帶來無可計數的利益，對戰相爭則有百害而無一利。特別是在世界史偉大的轉換期，若日支兩國能同心協力的話，亞細亞復興之事，當有如唾手可得吧。現在，若日支兩國能以復興亞細亞的大義為名結盟，並為了實現大義而攜手共進的話，印度也將隨即與吾等呼應，於是擁有各自的生活及理想的大東亞圈之建設，將有如順風揚帆般地進行吧。

這裡所提到的是，大川周明對於「日支兩國」關係所許下的亞細亞主義式願望。大川所提倡的「復興亞細亞」，是指從歐美帝國主義的支配和從屬關係之中復興，追求亞細亞的獨立之戰爭。現在應是「日支兩國」攜手成為「復興亞細亞」戰爭主要核心之際。然而何其不幸的是「日支兩國」現在卻處於對戰的局勢。那句「日支兩國非得如此不斷交戰下去嗎？」正是大川對解決之日仍遙不可見所發出的感

嘆。不過大川所指「支那事變」的解決，到底是什麼樣的局勢呢？難道只是指大陸戰亂的終結嗎？大川如此說道：

大東亞戰爭當前的目的，就是要從大東亞地區中掃蕩清除英美等敵對勢力，其次要作的是大東亞秩序的確立。爲此所需要的絕對條件便是支那事變的處理，也就是與支那的同心協力。

大川認爲，所謂「支那事變」的解決，是指「日支兩國」之間「同心協力」關係的實現。這正是爲實現「大東亞戰爭」的目的——「大東亞秩序的確立」——所需之絕對條件。所謂「支那事變」的解決，是指實現日本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和平互助的關係，若無此先決要件，「大東亞戰爭」所揭示之大東亞新秩序的確立就毫無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在「大東亞戰爭」持續進行的情況下來思考「支那事變」的處理，對大川來說是本末倒置的作法。

如果支那事變的解決，並不僅指大陸戰爭狀態的終結，還有實現日中兩國站在同一陣線、朝向亞細亞復興而努力的互助關係的話，就像竹內也曾說過：「太平洋戰爭開戰的1941年時，此問題並未獲得解決，透過1945年的敗戰也仍未能得到解決，到了現在《日美安保條約》改訂的1959年也將仍舊是無法解決的狀態吧。」而即使到了戰後60年的現在，也依然無法解決，我想已故的竹內一定會這麼說的吧。

三、日本近代史的難題

大川認爲「支那事變」的解決並不是要在「大東亞戰爭」期間作處理，倒不如說前者的解決才是後者的戰爭理念得以體現的絕對條件。他駁斥了把「支那事變」當成「大東亞戰爭」環節之一的想法，意即「支那事變」與「大東亞戰爭」就大川而言是兩場不同的戰爭。讓他對這兩場戰爭作出區別的，就是大川對「支那事變」所作的亞細亞主義式願望或要求。直接用大川的話來說，所謂的亞細亞主義，乃是將「日本的國家統一與支那革新，以兩者的密切結合來達成亞細亞復興」視爲維新精神繼承者之宿命課題的日本人之政治、思想立場。

只要此亞細亞主義式願望或要求存在著，「支那事變」就非得是發展到「大東亞戰爭」的戰爭過程。所謂的「支那事變」，是指本應是要共同復興亞細亞的同志的「日支兩國」，現在卻不幸地處於敵對的局勢。因此，事變的解決之道就是實現兩國本來該有的夥伴關係。為此，改變處於交戰局勢的「日支兩國」的現狀是不可或缺之事，這是我依循亞細亞主義的邏輯所作的解釋。只要提倡昭和維新的改革者仍肩負著昭和亞細亞主義的話，則「支那事變」的解決便必然能順此脈絡展開。然而日本大力推動昭和維新的體制改革時期早已成為過去。大川與青年將校們一起策劃被稱為「三月革命」的政變，也已經是昭和6年(1931)的事。10年之後，昭和16年(1941)「大東亞戰爭」的開戰，可說是把昭和初年體制改革的要求轉化吸收為總力戰體制的結果。儘管以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目的之「大東亞戰爭」已開始起跑，但離「支那事變」的解決卻越來越遠。大川的嘆息想必又將更為深沈了吧。

我回溯大川嘆息的原因，是因為竹內就像大川嘆息的原因一樣，認為支那事變無法解決。如同我之前引述的，竹內認為即便到了1959年的現在，支那事變依然未能解決。竹內認為日華事變的解決，並不僅指戰爭狀態的終結而已。他和大川同樣認為確立中日兩國同心協力的關係，才能使支那事變真正獲得解決。如此一來，竹內或許也同樣在支那事變中，帶入了一個亞細亞主義式的願望、要求，來作解讀吧。這麼想我們才總算能理解到，為何對竹內而言這是兩種戰爭。藉由觀察支那事變背後的亞細亞主義課題，支那事變就成了一場絕不會被太平洋戰爭所包括吸收，而是背負著對日本和亞洲而言至關緊要課題之戰爭。並且，透過將亞細亞主義課題帶入支那事變中加以解讀，讓竹內得以將這兩種戰爭與近代日本成立時即背負的二重性作結合。竹內把這種二重性稱為「日本近代史的難題」：

「近代的超克」，也就是所謂日本近代史難題(*aporia*)的濃縮。復古與維新、尊王與攘夷、鎖國與開國、國粹與文明開化、東洋與西洋等傳統基本軸上的對抗關係，在總力戰的階段中，在面對不得不去對永久戰爭理念作解釋時，一口氣爆發出來的，就是「近代的超克」這個議題。

「日本近代史的難題」，也就是近代日本難以解決的矛盾二重性，在昭和的體現便是「大東亞戰爭」。因此「大東亞戰爭」也擔負著「近代的超克」此一思想戰課題。何來此言呢？竹內認為那是因為所謂「近代的超克」，便是身處亞洲卻又不屬於亞洲，這個近代日本的難題（矛盾的**二重性**）的濃縮。竹內認為解決這個近代日本的難題，就跟支那事變的**真正解決**是相同且難以解決的問題。甚至可以說，這是日本能否以**亞細亞的方式**成為真正獨立自主國家之問題。然而日本人卻隨著1945年的戰敗忘卻了此一難題。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日華事變也被迫結束在曖昧不清的情況下。1959年的竹內回憶起1943年「大川的嘆息」而嘆息，便是為此之故。竹內在「近代的超克」再論的結尾，寫了如下一段話——「不得不再一次地重新面對此一難題。至少得要重返那使大川周明無言的時間點上，盡早解決那無法解決的『日華事變』」。

四、何謂亞細亞主義

至此，我似乎又將在之前文章中已探究過的「近代的超克」再論中竹內的推論，以「兩種戰爭」論重新作了一次整理。但我在此重新整理，並不是為了再次確認之前的結論。倒不如說是為了導引出該結論，或者先前所引用竹內所作的結語——「至少得要重返那使大川周明無言的時間點上，盡早解決那無法解決的『日華事變』」，對其邏輯結構重新作一番梳理。換句話說，竹內「日本近代史的難題」或「兩種戰爭」論是如何構成的，該結論是如何被推論出來的，對此重新加以釐清。這麼作也是在解讀竹內自身的「近代的超克」論。

竹內藉由「大川的嘆息」來敘述「日華事變無法解決」這件事。此事意味著竹內與大川同樣地將日華事變，用亞細亞主義的立場來加以解讀。先前也曾提過依大川的解釋，「亞細亞主義」乃是將「日本的國家統一與支那革新，以兩者的密切結合來達成亞細亞復興」視為維新精神繼承者之宿命課題的日本人政治、思想立場。我並不是想

說，此定義可以用來含括亞細亞主義的所有意涵。我只是將昭和日本國家的進路中成爲另一種選項(alternative)之政治、思想立場，亦即是將戰爭視爲兩種戰爭，透過解決日華事變來實現中日兩國互助性合作，將其視爲日本在亞洲的優先國家戰略之觀點，用來爲亞細亞主義作了以上的定義。這是竹內奠基於大川之論所提出的論述中，對於亞細亞主義所下的定義。讓竹內在思想上有強烈共鳴而引爲依據的大川周明「支那事變」觀，究竟能否成爲昭和日本國家戰略中的另一種選項呢？大川將自所謂的21條要求（1915年）開始的中日關係的推演，作以下概括：

因此儘管條約的精神顯然是符合亞細亞復興的要件，但緣起於此的支那的排日運動，年年不斷地越演越烈，當此運動波及至滿洲，方才有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而日本也像先前所說的，應藉此事變更改其錯誤的進路，回歸維新精神，表現出解放亞細亞之戰士應有的覺悟，努力與支那間重新建立比從前更緊密、血濃於水的結合。即便日本這樣的精神與理想，因對英美宣戰而如烈火般清晰可見，卻還是與蔣政權結爲亞細亞之仇敵，使興亞的大義不斷地被蹂躪，真只能用痛心疾首來形容。

在此大川所謂「其錯誤的進路」，是指華盛頓會議（1921年）開始到滿洲事變（1931年）爲止的10年間，妥協於所謂凡爾賽體制的日本對外政策。大川稱此時期爲「被英美讚爲世界模範市民的10年間」。並說「日本真實的樣貌爲闇雲所遮蔽，明治維新的兩大綱領被天皇機關說的橫行，以及爲求維持現狀之和平主義的跋扈所蹂躪，而向大陸發展等計畫也被視爲侵略主義者、軍國主義者的危險欲望」。而九一八事變則一口氣改正了日本外交上的錯誤。大川曾這麼說，「日本錯誤的進路，隨著滿洲帝國的建設，一舉轉向正確的方向。滿洲國建國，日本一舉拋開與壓抑亞細亞元兇之英美間的妥協，開始邁向興亞的大陸，就像是重歸維新精神一般」。包含糾舉日本錯誤的10年，由以上所引用大川的發言來看，其論述如何能說是昭和國家方向的另一種選項呢？對於以九一八事變爲突破點，透過軍事力量得以實現的日本帝國大陸政策，此一發言無疑是率先表達了強烈支持之意。那僅僅不過是在其中加入對亞細亞主義的改寫罷了。亞細亞主義在此只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裝飾色彩。只有在相對於主導

長達10年間日本錯誤進路的歐美妥協派時，大川的立場可視為另一種選項。但若說同樣與歐美妥協派成對比的亞細亞強硬派，也如大川一樣為另類非主流的立場的話，1931年以後這些論述反倒成了帝國主義日本的正統立場。昭和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絕非帝國主義日本的另一種選項。

那麼竹內引用大川言論並將戰爭予以二重化，講求日華事變的獨立解決，是誤解了大川的意思嗎？或者那是竹內別有用意的引用呢？

五、亞細亞主義的闡述性再構成

在竹內名為〈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的社論中，除了解說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外，也記述著他是如何重新建構亞細亞主義的。他在論說中只將玄洋社、黑龍會等論述認定為「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加以記述，把原馬克思主義者平野義太郎的「大亞細亞主義」貶得一文不值，言其「如此自稱大亞細亞主義，實則根本配不上主義之名，也不值得載於我國遺產目錄中流傳於世」。接著將平野的論述排斥於亞細亞主義之外之後，竹內還如此說道：

他（平野）不過是將玄洋社的亞細亞主義加以簡化並沿用。真正的玄洋社式亞細亞主義，雖然有些觀點看來是徹頭徹尾充滿侵略性，但並沒有像平野一樣將侵略性隱藏起來。而且玄洋社不昧於時勢，時有反抗政府之主張。因此作為亞細亞主義的一種類型，我們當然得要採用此派論述。

竹內將平野認定為非亞細亞主義之後，認為玄洋社式亞細亞主義名實相符而加以採用。由竹內所認定的亞細亞主義，無論是多麼侵略主義、膨脹主義的主張，只要是採取反政府的堅定態度，就會被認可是亞細亞主義。竹內的認可基準就是「不昧於時勢，時有反抗政府之主張」。以此反政府的抵抗態度，向大陸擴張的膨脹主義成為近代日本國家經營的相對立場，因而被竹內認定為亞細亞主義。確實亞細亞主義與近代日本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膨脹主義是不可分割的，是無法離開膨脹主義而獨自存在。竹內試圖從亞細亞主義中，找出決定近代日

本走向之對抗軸¹，因此也無怪乎以此概念寫成的〈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始終都在闡述著膨脹主義：

（亞細亞主義）特別是跟膨脹主義之間有許多重疊之處。更正確地說，從起源來看，亞細亞主義可以看作是自明治維新革命之後的膨脹主義中，所結出的一顆果實。而且，並非膨脹主義直接孕育出亞細亞主義，而是先掀起國權論與民權論，以及稍後的歐化與國粹等對立風潮，而後從這種可說是雙胞胎風潮中才有了亞細亞主義的誕生，這是我的想法。

而且，能否具體地區別「侵略」與「連帶」本來就是個大問題。玄洋社轉向上的處理也有所爭議，比方說在朝鮮問題上，最後雖然是決定以「日韓合併」這樣完全侵略的方式，但其過程極其複雜，也不能說其中沒有共同防衛俄國、清國的「侵略」此一層面的「考量」。

（亞細亞主義）無論再怎麼淡化，至少在內含以亞洲各國的連帶（先不問是否以侵略為手段）為方向這一點上，是無庸置疑的共通點。這也為亞細亞主義的屬性作出了最低程度的界定。

初期國族主義與膨脹主義的結合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如果否定這一點，那麼日本的近代化根本就無法實現。問題是，這與人民自由的擴大有何關係。

近代日本的對外膨脹主義，透過竹內的闡述，終於得到了亞細亞主義之名。按照竹內的觀點，亞細亞主義就是近代日本的國家形成或其發展道路上的另一種選項，也就是以亞洲原理形成對抗軸。如果說依歐洲原理來達成單一國家的先進化，是日本國家形成的基本軸、中心軸的話，那麼依亞洲原理的國家形成便是其對抗軸。所謂依亞洲原理的國家形成，如同前文中竹內所述，意味著以與亞洲各國的聯合為基礎，作為一個亞洲國家，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日本。那麼竹內敢對近代日本的膨脹主義（也是侵略主義）作出如前文般的闡述，又給予其亞細亞主義之名，這又意味著什麼呢？

1 譯註：若將對於某事物之特定想法、概念，想成是一軸狀集合，稱其為基本軸的話，對抗軸便可想作是相對於此基本軸，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角度的相對概念集合。

六、作為對抗軸的亞細亞主義

竹內認為，「初期國族主義與膨脹主義的結合是無可避免的」。確實在近代國家的形成中，一方面除需要具向心力的國家統合，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對外的膨脹或躍進來帶動國家發展。兩者都屬於國族主義。因此向中心聚集的國體論式國家統合化，以及向大陸躍進的國家擴大化，是近代天皇制國家日本從成立之初便賴以仰仗的兩大國家發展方向。在明治政府剛成立便有征韓論的提倡，也是因此緣故。那麼日本的近代國家形成，是在怎麼樣的歷史、國際環境下發展的呢？

日本開始轉型為近代國家的十九世紀後期，正是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稱之為「帝國時代」的世界史時期。他把1875年到1914年這段時期劃為「帝國時代」，意指「除了歐洲與美洲大陸之外，世界上大多數地區都被少數某些國家瓜分成正式統治區或非正式政治管轄區」的時代。所謂的少數國家，也就是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美利堅合眾國等，稍後日本也加入其中。在十九世紀後期所謂的先進國化，同時也是指加入先進帝國主義國家的行列。因為遭歐美軍事力要脅強行開港，而走上了近代化改革道路的日本，更是在亞洲的先進國家化之路上狂飆突進。這也是一條亞洲新帝國主義國家的自我形成之路。因此明治政府在明治9年(1876)與朝鮮締結了《日朝修好條約》。這是把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曾經強加於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條約，轉而由日本加諸於朝鮮身上。不過在日本源自亞洲的先進國家化過程中，在與歐洲的同化中，同時也孕育著與之相對抗的契機。因此向日本提出帝國主義式向大陸擴張需求的膨脹主義，其中也必然包含穩固日本在亞洲地區基礎之目標。而竹內之所以闡述性地將膨脹主義再構成為亞細亞主義，也正是因為向大陸擴張的膨脹主義有著穩固亞洲根基的目標。

然而日本膨脹主義所抱持之穩固亞洲基礎的目標，即使能成為日本帝國主義進路強而有力的輔助線，終究還是沒能成為國家進路的另一種選項。比方說，即使可以從宮崎滔天這個人的生涯中，觀察得到類似於竹內般的亞細亞主義，卻找不到可成為日本近代國家進路另

一種選項的政治性、思想性立場。竹內敢由膨脹主義中建構亞細亞主義論述，是由於某種思想態度。他把平野義太郎排斥在亞細亞主義之外，而認定玄洋社跟大川周明為亞細亞主義。如同我前文所述，這是由於可以從後者身上看到「反政府的抵抗」態度。或許有人會說，這是矮化了亞細亞主義，然而竹內在對膨脹主義作深入闡述的同時，又特別在日本近代史中牽引出作為對抗軸的亞細亞主義，或許正是由於他身上這種抵抗的思想態度吧。從征韓論到「大東亞戰爭」之日本近代史的二重化，乃是有竹內所導引出的亞細亞主義此一對抗軸才真正得以成立的。

亞細亞主義是相對於規定了日本近代史的中心軸，由竹內所導引出的對抗軸。何謂中心軸呢？則要依與其相對之對抗軸之間的關連性來定義。亞細亞主義的目標是，成為立足亞洲國家連帶之上的亞洲國家，追求日本的獨立國家形成。藉由導引出這條對抗軸，更能凸顯出貫穿近代日本國家形成的中心軸特色——在亞洲居於領導國家地位，致力於追求獨自歐式先進國化的這條日本之路。不過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我在此將亞細亞主義稱為「由竹內所導引出的對抗軸」。可是，這條對抗軸只要是不滿為歐洲原理所一元支配式先進國化道路的人，不管是誰都能導引得出來。因為我現在是透過由竹內所創作的〈近代的超克〉與〈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來加以探究在日本近代史中的亞細亞主義此對抗軸的真意，因此我才會將此亞細亞主義稱之為「由竹內所導引出的對抗軸」。更藉著將亞細亞主義稱為「由竹內所導引出的對抗軸」，來說明我並非將亞細亞主義預設為近代日本史中的思想實體來思考。亞細亞主義正如竹內所作的，其抵抗的精神可以引用為日本近現代史中的思想對抗軸。亞洲被竹內稱為「作為方法」的概念，亞細亞主義同樣也是非實體的、作為方法的概念。藉由竹內所導引出的亞細亞主義此對抗軸，日本近代史才首次呈現出對立矛盾、互相糾葛的二重性。而日華事變作為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也將帶給我們如永久戰爭般永不止息的思想課題。

最後我想引用竹內有關福澤文明論的論述〈日本與亞洲〉，來作為導向結論的橋樑：

ai r i t i

透過否定文明的文明再建。這就是亞洲原理，把握了這個原理的即是亞洲……日本是西歐，抑或是亞洲，絕不應只靠工業化的水準來判斷。應要視其是否具有自力發現更具概括性的價值體系、遂行文明抽象化的能力。如能，則可與亞洲原理相連結，不能，則只得與似是而非的偽文明共存下去。